

政治经济

北海历史上金融风潮概述

北海是在光绪二年(1876年)根据中英不平等的《烟台条约》开辟为通商口岸的，素有商埠之称。由于商业发达，金融活跃，故北海历史上的金融风潮，屡经起伏。而有记录可稽的历次风潮，无不与变幻的政治风云息息相关，这种规律，把金融信息说成是政治气候的寒暑表亦不谓过。

光绪十四年(1899年)，中国未有银元以前，市场通货均以银锭两为单位，另有辅币制钱(中穿方孔的老铜钱)和铜仙两种并用，辅币与银的比值时有起落，但一般标准是每“吊”(一千个)制钱抵铜仙一百个。每两银就抵制钱十“吊”或铜仙一千块(即俗称“一千钱”)。张之洞作两广总督之后，因为西班牙、英国等殖民主义者从广东输入大量银元，以吸收我成色比该洋银为高的银两。张之洞感到不妙，决然采取抵制措施，在光绪十四年特从国外进口铸币机在广东自铸银元。此种银元正面铸有“光绪之宝，库平七钱二分，广东省造”等字样；另一面则铸有双龙盘绕图案。称为“龙银”；此外还铸有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和三分六厘等四种小银元。其图文均与大银元同，只是钱数和大小不同而已。这是中国币制从银锭改为银元的滥觞。

民国初年，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而劫踞了“大总统”的宝座，三年(1914)铸造银元，因图案一面铸有袁氏侧面头象，故俗称为“袁头。”通行全国，并颁布了废除银两制改为银元单位的法令，是全国统一银元为单位的开始。此时，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已被袁世凯安插在广东的爪牙新军统制龙济光胁迫下台，龙氏取代了广东都督，另在广东铸有二毫银币通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广东各派政治力量亦互相倾轧，政局不稳。香港市场因而拒用此种广东银币，遂使北海商场顿起混乱，有的中小商户因此倒闭。

民国十年(1921)，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在金融领域向我伸进黑手，伪造大批

中国铜仙从香港运入本市，骗走了大批银元和真铜币。此种伪铜仙是用劣质铜泥块铸就，质轻易碎，掷地声哑，故称“哑板铜仙”，因伪铜币价的大贬，真铜仙亦受波及而贬降，使原来二十块兑银毫二毫比价，降为五十块。帝国主义的卑鄙手段，令人发指。

民国十一年(1922)，广东政权已归陆荣廷掌握，通令行使粤省银行发行的纸币。7月底，北海商民罢市，以示抵制。原来于6月间，孙中山命部将黄明堂率军自广西进驻北海，9月，被陈炯明部将黄强迫走，黄强入驻北海之后，迫不及待向商民勒索军糈，此时商民因抵制纸币，罢市风潮未息，这对于黄强军饷筹集极为不利，便向北海商会施加压力，(限令复市并筹捐军饷，商会不得已，召集商家开会，分摊认购部分粤币来作黄强驻军的饷项。同时于9月5日复市，风潮始息。

民国十二年(1923)1月，黄明堂率军来攻，时陈炯明已任命苏慎初为国防总办，驻军北海，与八属军阀邓本殷合流以抗击黄明堂军，结果邓、苏退走，北海重归黄明堂所治，因在北海开设兵工厂和铸币厂(在今园林管理处办公室附近)，铸就五分面额的镍币2.5万元，流通市面。本市商民鉴于镍币价值，在广州已大受贬损；且政权变幻，朝夕易帜，故拒而不用，金融风潮又起。但此次尚未酿成罢市。经黄明堂将军出面说服商会，才又由商会召集商家分摊，仅认购了6千元了结。事后将该镍币运往广州，仅得二成价值而已。北海商民又遭受了一次损失。

同年9月以后，八属联军总指挥邓本殷卷土重来，黄明堂不支而退，北海复归八属军阀统治，邓本殷把钦、廉、琼、崖、高、雷、罗、阳等属作为他割据统治地盘，作为长治久安之计，乃于钦廉二州分设铸币厂，铸造成色甚低的二毫银币，是为“八属毫”，饬令各地与成色优纯，威信卓著的“中山毫”等价使用。商民惮于压力，不敢公然抗拒，但黑市交易，均降为9折勉强通用，后来该币值每况愈下，商民又蒙受巨大损失，但军阀的私囊却反为充盈了。

民国十四年(1925)11月，陈铭枢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十师从江门而来，与桂军联合在海南岛驱走了邓本殷，12月1日进驻北海，本市结束了八属军阀的流治。十六年(1927)7月1日，北海设“中央银行支行”，这是继民国七年停业的

“中国银行北海分行”之后而设立的银行；同时设立分行金库。由广州总行拨给小洋(中山毫)一百万元作基金，并授权北海银行按基金额发行地方钞票，式样与总行发行的相同。只有加印“北海”字样，作为地方流通货币。十九年(1930)初，桂军张发奎率第四独立军(称为铁军)袭占北海，北海银行职员走避广州，银行停止营业，宣告：凡持有该行所发钞票的(当时大约为二十万元流通额)，可向广州总行十足兑换。但本市币值已狂跌到五成了。张部“铁军”不久被粤军第八路军赶走，北海秩序恢复正常。11月，北海银行复业，才将已发钞票按值收回换发新钞。二十年(1931)北海银行又因广东军阀陈济棠宣布独立的政局影响，于5月2日暂行停业，商民挤兑踊挤，仍有所发新钞16万元不及兑现，至使币值再次狂贬，商民又复人心惶惶。到12月16日，银行始行复业，宣布所发纸币全数兑现，金融波澜又恢复平静。

民国二十一年(1932)陈济棠为进一步使广东经济独立，把原“中央银行”改组为“广东省银行”，颁发纸币和毫银，是为“广东券”和“广东毫”。从1932年至1938年这段时间，金融较为稳定。陈济棠垮台后，国民党政府的“关金券”、“法币”和农民银行的“牛仔纸”，便在1939年前后充斥市面。其时，北海边防为桂军驻守，因而市面又有所谓“广西券”流行。但商场最欢迎的则是“袁头”、“龙银”和渐已稀少的“铜仙”。

1945年以后，国民党经济崩溃，通货恶性膨涨，法币充斥，成为人们累赘讨厌的“湿柴”，商民受损至惨。此时，人们都追求各种银元和外币以保币值。1947年以后，市面均以越南币(西贡纸)为本位，对于署名“田福进”的各种法币已成为一堆垃圾，但仍通行。是为历史上金融秩序最为混乱的时期。那时，如果手头没有“西(贡)纸”和银元，根本买不到东西，故凡持有“湿柴”的，贩夫走卒，官绅商贾，均想尽办法兑换银元或外币。因而金融找换业便应运而兴了。

这种靠金融波动，比价差距而行兑换外币银元图利的人，称为“银精”，他们均仰承当时操纵北海金融市场的、自设电台因而对于国际金融行情极为敏感的“力生行”老板李苏石的鼻息来讨生活的。中小工商业者和一般劳动群众，凡见到“银精”们串街走动“收盘”(入兑外币或银元)的话，便意识到“湿柴”

又进一步贬值了，凡手头“湿柴”不能发落的人便都心惊肉跳，寝食不安。

1948年，国民政府为挽救其行将瓦解土崩的政权，发行所谓“金元券”和“银元券”，大肆进行欺骗宣传，吹牛发金币为后盾，连哄带迫地限期要人民以外币，银元或法币兑换，人民苦于“湿柴”祸害，有的误信金币总胜于银元，因而挤兑“金元券”之风潮大兴，最初，“金元券”一元还可以兑换“金币”一枚，至使银行挤兑人群从早到晚万头钻动，争兑唯恐不及。一般老弱的贫苦人民，撇下营生时间来挤兑，整天未得其门而入，只好抱着大捆的“湿柴”蹲在骑楼底下抽泣。仅过两天，金币“兑完”了，“金元券”却大量抛出；但已由最初几天的5万元法币兑1元提到50万元兑换1元了。1949年初，法币虽渐为“金元券”代替，但它已紧步法币后尘，直线贬值，市场渐次拒用，而西纸、大银还有绝迹多年的铜仙便作为几乎清一式的流通货币。到12月北海解放时，“金元券”和未及发来本市的“银元券”。俱随同蒋家皇朝一齐扔进了历史垃圾堆。故俗谚云“今年见(金元券)明年不见”。诚哉斯言。

注：本文资料是参考前海关总署出版的《民国十一年至二十年最近十年北海海关报告》、北海关民国三年、十九年、二十年的《通商口岸华洋贸易论略》、《清史稿·钱法》、《合浦纪事》以及采访资料综合整理。